

编者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国民历史思维的培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要求广大青年养成历史思维的习惯，提高历史思维的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中华民族发展史”与原“四史”融合，形成“五史”。新时代背景下，做好“五史”教育，对高校课程思政教研工作提出全新要求。为此，要切实加强对“四史”课程建设，培养从历史真相中挖掘、提炼客观规律，以文化点亮新时代“四有”青年培育发展。

地方高校“四史”课程建设路径

杨懿 王东

“四史”课程包括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四个部分，在“四史”课程建设过程中，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融入其中，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重要路径。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四史”课程，既是一门历史学通识课程，又是一门思政课程。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高校，宁波大学所在的浙东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盛。近代以来，为抗击外来侵略者及国内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浙东地区涌现出了不少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以“宁波帮”为代表的商帮文化，则是浙东文化的另一张亮丽名片。宁波大学历史学系的“四史”课程建设，融入了这些文化元素，既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支撑，又能进一步弘扬浙东优秀历史文化，提升专业建设层次。

浙东红色文化融入“四史”课程

浙东地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浙东民众就自发组织力量，抗击英、法侵略者，彰显了浙东人民反帝斗争的坚定决心。五四运动期间，浙东地区学校师生纷纷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先进分子，如俞秀松、杨贤江等人，在浙东地区积极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在浙东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浙东红色文化资源最重要的

历史照进现实 文化点亮人生

张凯 陈炫铭

在科技日益发展、学术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各方推动逐渐形成学习与研究的热潮，同时也面临着较大挑战。以往的中国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存在教师主讲、学生主听，侧重教材教学，忽略学术性、前沿性、互动性等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信息传播更为迅速，学生的知识吸收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思维也愈加活跃，这就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结合“五史”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注重契合学生的知识面及兴趣点，强调教学互动，对传统课堂教学进行有效改革，让传统文化入脑入心。

追踪学术前沿，关注时代热点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课堂教学的内容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教师可在充分利用现有教材维持系统性教授的基础上，追索国际学术发展的最新前沿动态，并将其融入教学内容中，以情景式的教学，将学术前沿、时代热点与固有知识相结合，以专题化、学术性的形式，让学生在自主学习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做出更有前沿性的思考和研究。

学科融合是这一时代的全新教学发展理念。在综合型人才需求越发迫切的当下，传统文化课堂应当突破学科壁垒，根据内容实际穿插多种学科的有效知识，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育学生对知识的多维应用能力。中国传

代表就是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浙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党中央指导下开辟的，为浙东地区抗日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统称，分别是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地区的重要战略阵地。1941-1949年，在浙东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根据地广大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在“四史”课程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这部分内容时，就可以融入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历史。

浙东红色文化蕴含了革命先辈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救亡图存的革命信念，是整个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东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在“四史”课程设计中融入浙东红色文化，能够进一步坚定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进而积极引导他们勇担时代重任。

“宁波帮”文化融入“四史”课程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四史”课程都会涉及改革开放的历史。“宁波帮”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宁波大学又是由“宁波帮”著名人士——包玉刚先生倡建的一所高校。因此，在“四史”课程教学中融入“宁波帮”元素，具有天然的优势及特色。

1984年8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这一指示，经过

深入传达，广泛宣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海外宁波籍人士热烈响应小平同志的号召，纷纷回乡探亲访友，了解情况，洽谈投资，开展贸易，捐钱兴办公益事宜，支援家乡建设。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发挥宁波港的作用。1985年1月，他在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谈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时说：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轮船，是个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轮船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所以发展长三角，如果把上海、宁波连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日后宁波港发展成为国际性重要港口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宁波帮”与宁波的改革开放事业密切联系的真实写照。

香港回归祖国，是“四史”课程中的一个重要篇章。香港回归过程中的历史，就是在1985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担负起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一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确定，包玉刚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讲述包玉刚先生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的历史，有助于学生在学习“四史”课程这一段内容时，更加深刻了解香港基本法对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意义，以及“宁波帮”的爱国情怀。

地方高校“四史”课程建设的实践路径

“四史”课程是对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

内容组织课堂讨论课，围绕特定主题进行深入探讨，重点考核学生的平时阅读量及逻辑思维力。同时传授学术研究的方法。这种互动机制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还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使他们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和独立思考。

当前，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迫切需求，对新文科的建设提出迫切的人才需求。这种情况下，在运用创新思维强化学生传承传统文化兴趣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学术本身的严谨性，要把培养研究型人才培养的“牛鼻子”。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基础环节，除了强调通识基础外，也需有相当程度的专深，为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打好坚实的专业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课程内容进行项目式探研，鼓励引导有潜力的学生就讨论分享的主题进行深度打磨，积极引导其参加科研创新项目及“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等各类赛事，推动学术落地生根，赋能社会现实。这样的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还能有效培养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激发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探究。

融入地方实践，渗透以文化人

浙东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在宁波地区的生动体现，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有普遍的文化价值。因此，一方面可在课堂讲授中穿插浙东文化专题，深入探讨总结浙东文化的历史渊源和

余年来历史的一个高度浓缩和全面总结。这里面含有不少与地方高校所在地历史文化相关的知识内容。作为地方高校，在讲授“四史”课程时，不应将“四史”课程内容孤立起来。因此，在课程设计中，要有意识地将地方文化资源与“四史”课程内容关联起来，有机地融入课堂授课中，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区域历史与重大历史的关系，激发学生进一步渴望了解地方历史中所蕴含的“四史”元素，促使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四史”课程中的相关知识点，强化其对书本知识的汲取。尤其是在教学内容设计中，应当积极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和重要历史事件，融入“四史”课程中，再结合具有特色的个案进行讲授，进而激发学生对“四史”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作为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课程，也应注重协调历史学专业与“四史”教学关系。“四史”课程不是单纯的史学专业课程，作为“四个自信”教育的关键性课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四史”课程脱离了史学专业教学的方法手段，“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叙事逻辑，往往能增强思政课程的吸引力，有利于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同时，应当充分把握“四史”各课程特性。“四史”课程四个看似独立的部分，实则相互关联在一起，密不可分。在探究“四史”课程建设路径时，有必要根据各门课程的不同特征展开设计。【本文系2024年宁波大学教研项目“地方高校‘四史’课程建设路径探析”(JYXM2024045)最终成果】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四史”课程建设负责人，宁波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文化内涵，帮助学生了解浙东文化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可将授课从课堂延伸至课外，通过实地走访考察浙东历史文化遗迹、组织开展相关社会实践，使学生更加生动直观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韵味和魅力。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在宁波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物质文化遗产，例如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等儒家先贤的故居，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保国寺、雪窦寺等佛教著名寺院，城隍庙、清道观等体现道家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场所。此外，天一阁、宁波帮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等体现宁波城市特色的文化地标，以及余姚梁弄横坎头村等浙东红色文化基地，都是实践教学的优质资源。通过建立实践基地，强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新模式，把“教书”与“育人”、“为学”与“为人”有机结合，引导大学生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五史”中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并内化为精神信仰，外化为自觉行动。

此外，数字赋能文化育人是新时代激活教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历史机遇，天一阁、宁波博物馆及各类展览馆和纪念馆已推出虚拟现实、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型数字技术手段，教师可借助数字化平台，带动学生进行沉浸式体验、混合化教学、互动式参与和个性化学习，让课堂教学在网络空间延伸和数字场景拓展中实现新突破。【本文系2021年宁波大学教学研究项目“新兴技术范式下的教师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为例”(JYXMYB2021023)最终成果】

(作者分别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学系主任、宁波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研究生)

深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课程思政建设

李翔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是高校历史学专业一门比较重要的本科基础性课程，核心内容在于系统讲授中国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该课程既有史学的性质，又具有政治学的特点，同时与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有密切关系，综合性较强。传统史学课堂，侧重于系统讲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基本知识、原理和研究方法，探究历代典章制度特点等。今日“新文科”建设，鼓励交叉学科及交叉融合学科的建设，该课程正具备较好的学科交叉基础，其中尤以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交叉最为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以制度演进为视角，探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强化“五史”教育的有益尝试。

课程现状及存在问题

史学、政治学、法学等专业均开设《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或《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各有教材，侧重性略有不同。代表性的历史学教材有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政治学教材有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第四版)等著；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则兼具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特征。各专业开设课程相似，内容难免存在重叠，主要在课程体系及内容上有所区别。史学课堂以史料解读为基础，侧重于古代政治制度发展脉络的讲授，由此加深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认知。政治学课堂立足于政治学理论，更多剖析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政府运行机制特点及监察、军事等各种制度的变化发展等问题。整体而言，不同专业的课程特色明显，融会贯通尚有不足。

本课程与通史课程在内容上也存在重复，定位需更明晰。历史系本科生一般在低年级阶段接受通史课程的系统学习，本课程主要开设在高年级阶段。制度史学习与通史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在制度史课程教学中，特色不够明显，与通史课程区分度不够，无疑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课堂教学

首先，加强与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联系。政治学教材从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政治制度、政府管理机构及运行机制等角度展开。从现有教材上看，专业间的交流及借鉴并不多，有一定提升空间。本课程革新立足于史料解读、侧重梳理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吸纳政治学中关于制度构建、政府运行机制、官制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从而拓展课程视野及理论深度。

其次，与通史课程有所区分。本课程应侧重于梳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脉络，比如皇帝制度、宰相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科举制度等，突出专题讲授，内容上主要凸显两点：一是系统性，教师需要全面系统地讲述各项制度的基本知识，由点及线地梳理制度演进脉络；二是学术性，内容上保持一定的深度，引



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学生“寻四史、识国情”实践活动在慈湖烈士陵园开展

宁波大学历史学系学生参加“寻四史、识国情”文化考察活动